



末那

钱文忠 著

皈依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海上

Namo Manase

末那皈依

钱文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那皈依/钱文忠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4
(海上风)

ISBN 7-80678-512-4

I. 末... II. 钱...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322 号

末那皈依

钱文忠/著

责任编辑/欧阳亮

技术编辑/张伟群 丁多 装帧设计/王 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53,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书号:ISBN 7-80678-512-4/1·53

定价: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汤一介

我认识文忠已经十五六年了,当时他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是季羨林先生很是看重的弟子。一谈之下,就感到这个年轻人不仅聪慧过人,而且博闻强记,知识面之广,很是令人吃惊。当时很为先生庆幸,终于获此理想之传人!私心认定文忠一定能在先生的培育下,领军于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

不想世事多变,虽经我们多方奔走努力,文忠毕业后仍然未能留在北大继续他的研究,如此人才流失,令人痛心疾首,无疑是北大的一大损失!此后,文忠流落京沪,连登记一纸平民户口亦数年而不可得!1999年,我去香港教书,无意中读到1999年7月的《香港书评》,一则大标题赫然在目,是“中国学术界的希望——《瓦釜集》及其作者钱文忠”!文章对文忠的学思历程作了简要介绍,最后说,很多人以为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中国学术界后继无人,而今,“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1990年,文忠离开北大后,我们仍常有往来。因他梵文造诣颇深,我在讲佛经有疑难时常向他请教。今年9月由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季羨林研究所”成立大会,我虽在病中,但这个会必得参加。主持人临时让我讲几句话,由于我全无准备,一时不知讲什么好。我未曾直接上过季先生的课,但一向视先生为我最敬重的老师。要讲先生的为人、为学,也许几天也说不完,突然想到孔子总结他自己为人、为学的两句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想,用这两句话来概括先生也是很恰当的。在谈到先生的“诲人不倦”时,我提到新任命的“季羨林研究所”副所长钱文忠,认为文忠的古今中外学术和多种语言基础都有条件足以步先生之后尘,使先生的为人、为学都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近日粗读文忠的《末那皈依》更感到我以上的信心和期待不会错!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如果历史不是先有“构架”,后找事实“填充”,而是从事实碎片出发,汇集为历史洪流,那么,文忠书中极为宝贵的历史片段就是建立历史大厦的砖瓦木石。清末以来,由于西学的输入,中国学术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总结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的发展无疑对中国学术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文忠的文集定名为“末那皈依”可能即有此意。这本文集对清末以来的众多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不仅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而且自内而外,对他们的心态思绪、为人风范都作了他人力所未逮的历史分析和情感分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百年来,我们已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有钱穆的

同名著作,这对我们研究清初至民国初年的学术史很有帮助,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清末以至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书。特别是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学术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与此同时,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有了不可忽视的新进展;又加以近日新出土文献之丰富,及对其研究的重大成就,也许,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可以撰写一部《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时候。这将会大大推动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使我们得以从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 20 世纪传入的西方学术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进入以创新、开拓为本的“接着讲”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学术文化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阶段。我认为文忠将是撰写《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最佳人选之一。我们期待着能早日看到他为总结中国百余年学术发展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目录

序 / 汤一介	1
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	
——季羨林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1
“必须有心的光明”	
——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18
牛岛鮎子女史	46
井上大卫教授	50
回归巴别塔之前	53
冥顽与愚痴	57
沈曾植其人其学	62
神州袖手人陈三立	70
男爵及其幻想：纪念钢和泰	87
侠儒经师黄季刚	95
书信里的陈寅恪	104
风住尘香花已尽	
——韦莲司·胡适·杨联陞	107

赵元任的笑与哭	118
江流世变心难转	
——吴宓先生的伟大悲剧	123
郑振铎与战乱中的文献	128
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	139
红与黑	
——从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看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历程	148
“毕竟是书生”	
——纪念周一良先生	156
忆丹枫先生	166
婆罗耆宿朱西邨	169
一位没有著作的学者与作家	
——纪念李铮先生	172
呕血心史随人去：送钱钢兄远行	177
附录一 《瓦釜集》后记	183
附录二 无用之物方有大用	190
附录三 钱文忠：国学不是国产“心灵鸡汤”	194
后记	197

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

——季羨林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从齐鲁大地到清华大学

季羨林先生，字希甫，以名行。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归临清市）官庄，家贫重学。六岁之前，师从马景恭先生。六岁赴济南投奔叔父。叔父无子，视先生为己出。先生叔父自学成家，曾自编自选理学文章成《课侄文选》，教授先生。高小期间，先生开始学习英语。初中就读于正谊中学。正谊校长鞠思敏毕生言行一致、气节炳然，对先生人格之形成有重要影响。课余参加古文学习班，习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先生初中期间即无书不读，尤好说部。

在正谊读了半年高中之后，先生于1926年转入山东大学附设

高中。曾作《读〈徐文长传〉书后》，获齐鲁名儒国文教师王昆玉激赏，批道：“亦简劲，亦畅达。”先生由是研读韩、柳、欧阳、三苏诸家文集。因考试成绩连续名列第一，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前清状元，平时惜墨如金的王寿彭先生亲书对联、扇面以为奖励。并于此时始学德文。

1929年，先生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在胡也频影响下，开始阅读由日文转译为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并作有《现代文艺的使命》等文。在董秋芳（冬芬）影响下，开始用白话文写作。董对先生十分赏识，许为“全校之冠”。

次年，先生赴北平，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先生决定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先生自己回忆，大学期间所修课程中对先生影响最大者有两门：朱光潜先生所授的“文艺心理学”及陈寅恪先生所授的“佛经翻译文学”。1934年，先生毕业，学士论文为“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导师艾克教授（Prof. Ecke）。大学期间，先生与吴组湘、林庚、李长之等往还甚密，讨论评鹭中外文学作品，并且创作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作，名列《文学季刊》的特约撰稿人。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先生没有应同学胡乔木（时名胡鼎新）动员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仍然到胡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教书，并且积极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卧轨绝食，要求出兵抗日。

毕业后，先生应济南高中宋还吾校长之邀，返鲁任国文教员，同时继续参与编辑某大报文学副刊。期间，郑振铎先生请先生将几年来所写散文编集，收入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予以出版，后因先生出国未果。

留德十年

1935年,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互换留学生合同。由于先生在清华主修德语专业,四年成绩全优,一申请即获通过。同年秋,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Hauptfach)印度学,副修(Nebenfach)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

先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深沉的理由的。从学术大潮流来看,清末以来天竺圣方一直是中国知识人除了西方、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关注点。黄侃曾在《蕲春黄先生语录》中概括道:“近人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章太炎、苏曼殊等皆可为例,他们甚至还都研习过梵文。从学术小环境来看,陈寅恪、汤用彤先生将西方的东方学和中国传统考据之学加以结合,开辟了新的学风,对有志预流的青年学者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就先生个人而言,早就立下志愿:“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真有本事,就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决意不作有关中国的题目,甚至也不考虑将汉学列为副修,以节省精力。这种做法和当时留学生的风气迥异。连在清华时即著才名的乔冠华为了早得博士,也不惜如鲁迅所讥讽者以庄子为论文题目。乔固非不能者,尚且如此,他更无论矣。

先生师从哥廷根著名学者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陈寅恪先生译作“林治”)、西克(Sieg)、布劳恩(Braun)等教授研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短时间学过希腊文、拉丁文。留德十年的大半时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生活非常艰难。用先生的话来讲:“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

是,先生则“积稿盈案,乐此不疲;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认为,这十年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段,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1941年,先生以全优成绩通过口试和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 Mahāvastu”(《〈大事〉迦佉部分的动词变化》)。*《大事》*系用佛教混合梵语写成的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向称难治。先生是全面系统研究该部分动词形态特征并加以总结的第一人。此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西克教授认为极好,而且连克劳泽(Krause)教授也赞不绝口。克劳泽是比较语言学界的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却有着惊人准确的过耳不忘的记忆力,掌握数十种语言。他对先生论文中有关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评价。因为古希腊文里也有类似的语尾,所以,先生博士论文的成果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在这段本身不算太长的黄金时段的余下的近五年时间里,先生还用德文在哥廷根重要学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经典性论文,篇幅之大都接近甚至超过了专书,得到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几十年来反响不绝,从而奠定了先生印度学、佛教学、吐火罗语研究的权威地位。1944年,先生出版了引起半个多世纪讨论的名作 *Die Umwandlung des Endung -a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中世印度语中语尾-am向-o, -u的转换》)。这项研究的贡献在于,先生发现并且证明了这种语尾转换乃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此书在发表后不久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著名梵学家艾哲顿(F. Edgerton)在1953年出版的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字典》)的导论部分用了好几个章节的篇幅来与先生争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跨越了半个世纪,以后还有论文加以讨论。在先生

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的1949年,实际上先生于1945年回国前已经完成而留在德国的一部论著由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安排在哥廷根刊行,这就是名著 *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ue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定佛典年代和起源的标准》)。在其中,先生指出并且证明不定过去式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半摩揭陀语的一个语法特征,文章的意义在于为在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信史传承的印度历史背景下,判明佛教研究所必须了解的佛典年代和来源地提供了相当可靠的语文学方法。这项成果一直备受学界重视。1980年,先生访问日本。由于先生受多重因素限制,多年以来被迫中断了对该领域的研究,因此,当时的日本学者虽然都知道先生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但是对先生与印度学的关系却不甚了了。日本梵学大家原实教授借着酒意问道:“听说您在德国学过梵文,教授是哪一位?”先生答道:“在哥廷根,教授是瓦尔德施密特。”原实教授接着问:“您或许就是那位研究梵语不定过去式的 Dschi HianLin(先生名字的德语拼法)?”据后来到北大师从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优秀梵文、佛教学者辛岛静志教授回忆,事后,原实教授对他说,他简直不能相信,40年代就发表了两部德文专著、推动佛教混合梵语研究的学者,三十多年后竟坐在自己面前。

二战期间,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被回聘,先生遂从其研究《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大疏》、《十王子传》等印度古典。西克教授是吐火罗语研究的奠基人,先生从其游,成为东亚通晓这种天书的第一人。1944年,先生在ZDMG(《德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刊发长文“Para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nyavantā-Jātaka”(《〈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利用该经的其他语言、特别是中文译本,确定吐火罗语本某些词汇的语意,为

当时对该问题几乎束手无策的欧洲学者别开蹊径,在方法上取得了典范性的突破,至今仍然被吐火罗语研究者遵奉。

1937年起,先生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讲师,与著名汉学家如夏隆(Gustav Haloun)、韦利(Arthur Waley)、冯·梅兴-黑尔芬(Otto von Maenchen-Helfen)相从论学往还。先生在汉学系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汉籍,尤其是笔记小说和汉文大藏经,为此后不得已的某种意义上的转行打下了坚实基础,使得先生迥异于离开了西方本行资料只能完全中断研究工作的留洋学生,回国后,尽管只有像先生自己戏言的那样“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却依然能够很快地另辟新境,在新领域里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无奈的看碗吃饭

先生于1945年秋冬之际,急切而又依恋地告别了生活工作十年之久的哥廷根,居留瑞士半年。次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一路备极艰辛,经香港于夏末回到阔别了十一年的故国。同年秋,陈寅恪先生将先生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先生遂应聘任教北大,在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后,即被聘为教授并任东方语言系创系系主任(先生担任此职直至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为此,先生辞去了已转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夏隆赴剑桥任教的聘请,全身心地致力于培养中国东方学者,建立、完善并推动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成为中国东方学之父。

虽然郑振铎先生认为到北大教梵文几乎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不过,即使是北大,尽管后来有了陈寅恪先生因无钱买煤而以两千美元的低价转售的一批东方语文书籍,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汤用彤先生捐赠的一批梵文、巴利文书籍,图书资料仍然远远称不上完备。先生不得

不就自己的研究方向稍作变更,转以有大量汉文材料可资利用的佛教史、中印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为主要领域了。“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无奈之言。1947年,先生的名作《浮屠与佛》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英文本刊于 Sino-Indian Studies)。此文堪称发千古未发之覆,考明梵文的 Buddha 在龟兹文中变化为 pud 或 pūd,在焉耆文中作 pāt,此乃“佛”的直接来源,故“佛”非“佛陀”之略称,反而后者是前者之加长。由此,不仅说明了“佛”在汉译佛典中的出现早于“佛陀”这一史实,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而是通由中亚间接入华的。佛经译者用来字母翻译梵语的顶音,这个现象曾使许多音韵学家困惑不解。先生在 1948 年撰写了《论梵文 ṭ ḍ 的音译》,指出中文用来字母翻译梵语的 ṭ ḍ 是由于早期的佛经系用俗语(Prakrits)写成,而在俗语里正有 ṭ > ḍ > ḷ 的语音变化。先生将这个语言译过程分为后汉至魏晋南北朝、南北朝至隋、隋以后三期。借此,先生最早明确强调“华梵对勘”必须有一前提,即必须首先证明音译字直接译自梵语,否则无从勘起。可惜,许多学者在从事对音工作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果自然怪说蜂起,舛误百出。运用华梵比较,解决汉文典籍真伪问题,是先生运用纯熟的研究方法之一。《列子》系伪书,少有异议,然而这部伪书究在何时造成?造伪者何人?则无人能够断言。先生于 1949 年发表《〈列子〉与佛典》(英译文刊 Studia Serica),发现《列子·汤问篇》中有一段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卷二十四中之故事雷同,进而广征博引,证明《列子》出于太康六年(二八五年)之后,本文、序及注均出自张湛一人之手。同年发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英译本刊 Studia Serica),引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材料,考证上述正史所载诸帝形貌实有佛教传说杂糅附会于其间。研究

手法之圆熟、考证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1949年后，东语系改为以培养党的外交、翻译人才为现实服务为主，在急速扩大的同时，逐渐走上了与创立之初的宗旨不同的道路。先生任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在仍然担任系主任的同时各种兼职压到了先生身上，行政工作加重了。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研究方向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先生的领域无奈地移向印度文学、近现代印度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先生翻译了《五卷书》、《优哩婆湿》、《沙恭达罗》、部分《十王子传》和《佛本生故事》，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介绍文字以及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出版了《印度简史》、《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印度民族起义》；撰写了研究造纸、造纸法、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论文，将有关论文编成《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除此之外，先生还和曹葆华合作，翻译了马克思有关印度的论述，编成《论印度》一书。翻译工作还延伸到德国文学，如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这段时间，先生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散文。

至于先生的老本行，由于各种原因，显得相对寂寥了。但是也发表了《记〈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论文，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不过主要以介绍为主，与留德期间的工作情况不同了。在这段十多年的时间内，先生仅有的两篇研究原始佛教语言的论文都是由于偶然机缘写成发表的。1956年，据印度传说，乃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先生特撰写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在无从利用欧洲战后发表的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困难条件下，以汉文材料为依傍，证明了使欧美学者聚讼不已的“*sakā nirutti*”既非指“佛自己的语言”，亦非“文法”，而是指“比丘们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佛允许比丘用各自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言。这里所指明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原始佛教不允

许比丘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法,也并未规定以某种语言作为标准经堂语。上文提到,先生的两部德文论著引起了印度学界的轩然大波,不过,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要晚至1958年。北大图书馆当时还可以从国外订购学术书籍,先生也就有机会看到艾哲顿于1953年出版的皇皇巨著《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字典》。针对其中与先生的争论,先生于1958年发表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反驳艾哲顿的意见,赞同德国梵学巨匠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的说法,主张原始佛教有一种用佛教原始语言,即印度古代东部方言半摩揭陀语(Ardhamagadhi)写成的佛典,以大量的材料,再次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先生基本上被看作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加上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罕见的穷苦出身,一贯谨言慎行谦虚下人的高尚品格,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是生命尚未受到威胁,物质生活尚有保障,工作环境虽不完美却也尚未遭到彻底摧毁,授业著述的自由尚未被剥夺。然而,一场践踏了先生学术生命中最好的十二年中年年华的大革文化命的狂风骤雨到来了。

疯狂岁月里的壮举

从文化大革命初始时期到工作组被赶跑,先生还是被划在“临界线”上的,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久,先生按捺不住义愤和正义感,主动跳了出来,反对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聂元梓,其结果当然是马上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在历经极其野蛮的批斗,饱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之后,被关进了“牛棚”。工作的权利理所当然被彻底剥夺,生活水平也被降低到几乎难以维生的地步,遭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这一切都真实地记录在《牛棚杂忆》之中,诸般